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舉世矚目的美國大選將於今年11月初舉行，究竟賀錦麗(Kamala Harris)抑或特朗普(Donald Trump)將會登上總統寶座？在是次兩極化和戲劇性的選舉中，側面折射出美國民主制度正在經歷怎樣的轉變？美國的民主實踐是否如論者所指，從過去的典範變為禍亂的根源？敝刊將於12月號刊出多篇專文，予以深入剖析。

——編者

## 微觀視域下的中共黨員 與黨組織

國共內戰時期，中共隊伍急速擴張，在所難免地出現組織渙散、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等現象。1947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在土改中普遍整頓黨的隊伍的決定，歷時一年半的「整黨」逐漸開展起來。任耀星的〈國共內戰後期中共基層黨組織運作——以河北容城私派地下黨員案為中心〉(《二十一世紀》2024年8月號)便取景於這一歷史場景。

既往中共黨史研究，往往偏重考察黨組織的整體運行情況，對基層黨員的生存狀態和活動軌迹關注略顯不足。任文

通過剖析河北容城黨組織私派地下黨員楊楫潛伏北平的歷程，揭示了中共轉向全面進攻背景下的地方黨組織，如何在遵守中央紀律與滿足地方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這一案例表明，黨組織並非鐵板一塊，央地關係存在複雜的面相，中央政策在地方本位主義傾向影響下可能被扭曲。當然，這些活動也讓我們看到了基層黨員和黨組織在嚴酷戰爭環境中的生存困境和鬥爭策略。該文以小見大，為我們了解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地下工作的真實樣態提供了寶貴細節。

不僅如此，以往中共革命史研究偏重從中共革命的內部視角梳理歷史事件，有時難免將革命者、革命理想與革命實踐混為一談，甚至在不自覺中將自己劃入了革命者陣列，成為革命理論、政治話語的宣講人。任文則利用國民政府訴訟資料，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研究中過份依賴中共資料的局限性，使研究更加多面和客觀；另一方面打破了國統區與解放區間的隔閡，從國統區視角審視解放區黨組織的活動，從而展示國共雙方在城市工作中的隱秘聯動關係。楊楫的個人軌迹和基層黨小組的活動，正是

以往宏觀敘事中的模糊地帶，為我們理解革命史中的微觀動態提供了新視角。

此外，任文還聚焦基層小人物，了解他們如何看待革命。革命的鐵流奔湧而來，個體生存的要求總是因為不那麼積極而被遮蔽，人的欲望更多時候也讓位於革命的理想信念。然而，基層革命的熱情有時很難敵得過現實的消磨。儘管小人物亦不乏捨生取義的氣魄，但日常更無法擺脫掙扎生存的無奈與糾結。任文着力刻劃的革命洪流中的小人物，雖然在歷史大事件中沒有突出的表現，但是歷史大事件卻無時無刻影響着他們的思維意識、生存方式和生命軌迹。這些影響一般並無明晰的證據可尋，但對時人而言，卻無比實在。同樣，這些小人物以革命為名的所作所為，其實也很難區分是在為革命服務還是為自己的生存服務，而這或許本就是革命無法言明的一部分「真相」。

鍾欽武 青島

2024.9.5

##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舊方法 與新問題

李彤的〈河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個案研究(1957-1958)〉(《二十一世紀》2024年8月號)從微觀的視角出發，對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了生動、細膩的研究。1956到1957年間，隨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進和「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農民出現了退社、

「鬧社」風潮、鬧糧、「鬧糧」等問題。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中特別指出：農村也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樣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對於農村社教運動，學界或聚焦高層的宏大敘事，或探究其與反右運動的關係，忽視了對底層草根的案例研究。李彤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充分運用基層檔案，系統梳理河北Y縣農村社教運動的來龍去脈，揭示出農村社教運動與城市反右運動在實施方法、實際步驟和處理結果方面的異曲同工。

要言之，在邏輯理路上，無論城市反右運動抑或農村社教運動，高層皆對形勢做了嚴峻估計，認為出現了「兩條道路的鬥爭」，並對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知識份子或「搗亂」的地富和富裕中農進行批判，出現所謂「擴大化」的現象。李文更指出，這種「擴大化」從橫向範圍轉化至縱向深度，即從「思想問題」升格為「階級鬥爭」。

以河北Y縣為例，在A村進行社教運動的試點，在排隊摸底、圈定目標對象的過程中，將對糧食政策的普通不滿上升到對「資本主義思想」路線的批判；在鳴放過程中，將無關是非的問題引導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在強勢政治話語下，鄉村日常生產、生活的細枝末節被貼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對立的標籤，具有了超出日常生活的政治意涵。在運動中，「廣大農民社會主

義覺悟大大提高，積極踴躍交糧」，使最初的糧食徵購任務得以足額甚至超額完成。

在文末，作者轉向一個發人深省的視角，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共所遇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的問題多為新問題，卻慣於沿用熟習的階級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這也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長期在艱辛探索中曲折發展。因此，對於現實所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究竟應以何種方法去應對，實是考驗領導者智慧的試金石。

張熙 金華

2024.9.14

## 中國革命魅力在法國的外溢

高嘉懿的〈革命思想的回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傳播〉（《二十一世紀》2024年8月號）向我們展示了1949年後法國左派政黨、知識份子等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想像與宣介，並揭示了中法兩國革命文化能夠產生共鳴的原因，從而為中法關係史，法國政黨史、左翼史和知識份子史等領域的研究添加了新維度。

中國的革命文化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中共建國和立黨的根基是馬克思主義，而在早期中共領導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地巴黎曾起到重要作用。這對後來新中國領導人觀察法國政治、領導人等，都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中國革命經驗和新中國的意識形態，是否對包括法國在內的國家產生影響；如果有，通過何種方式、產生

甚麼程度的影響，則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高嘉懿聚焦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階段——即毛澤東思想，如何在法國傳播進行了深入討論。在法國知識份子看來，中國革命思想中挑戰權威、去殖民化、反霸主題、人民意志等，和法國傳統中的自由、平等、博愛交相呼應，既成為解決資本主義快速發展背後社會危機的可能「良策」，又反映了自身的理想追求。因此，他們在看待中國革命時，出現了烏托邦的幻想。而當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情況被更多地了解甚至在中國被批判、平等與個人崇拜並存為人所知，這一烏托邦也逐漸消逝。

毛澤東思想在法國的沉浮，也揭示了中法黨際交往和國家關係的複雜互動。對中國來說，黨際關係和國家外交在相當程度上是重合的。中國對法宣傳，既是黨的意識形態對外投射，也是國家外交的實施。實際上，在高文所描述的中國駐瑞士大使館1963年9月制定對法國左派具體的工作方針前，中國更高層次的對法外交機構——新華社駐巴黎分社就在當年2月得到劉少奇的批示，「可多做些報導和翻印我反修文章的工作」。而對法國來說，無論是始終未執政的法國共產黨，還是法國社會黨或其他知識份子，他們更多是從個人、黨派而非國家的視角，來看待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建設經驗。對他們來說，遠在東方的中國革命思想確有魅力，但其光芒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成為左右法國國家政策的意識形態根基。

姚百慧 北京

2024.9.15